

四海友声

“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以下简称《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它应该回到中国去。”英国著名汉学家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于2023年获得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并于同年入围首届兰花奖“杰出成就奖”。退休前,吴芳思负责“照看”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万件敦煌文献。提起《金刚经》,老人的眼睛亮了起来。

修复

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金刚经》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扉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

运抵大英图书馆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托裱。但吴芳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背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她心中最重要的事。

从2003年开始,吴芳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同工作。马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

《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芳思忧心不已。卷首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化学试剂?她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如释重负。

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



半世敦煌梦 一生丝路缘

邢雪

芳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

历经近7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版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心,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芳思的话中充满敬意。

助力

1977年,29岁的吴芳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

她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她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

吴芳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吴芳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印、电子化和编录,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

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珍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芳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

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3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芳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盼归

在吴芳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来说,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2019年,吴芳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她初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

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她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参观开始前,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

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芳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

吴芳思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20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从莫高窟藏经洞中攫取大量敦煌文物,“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均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她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祭》: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除敦煌文献外,还有汉代简牍、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陶瓷玉器等。“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

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吴芳思、马克·伯纳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丝绸之路2000年》:吴芳思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以上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纸的全球简史

王海利

加马人发明以羊皮造纸的技术。公元5世纪开始,羊皮纸在欧洲逐渐得到广泛应用。与莎草纸相比,羊皮纸耐折,质地洁白,深受欧洲贵族喜爱。

纸与古代中国

在中国,纸发明前的主要书写材料最早是甲骨,然后是简牍和缣帛。人们普遍认为东汉蔡伦是纸的发明者。但据现代学者研究,中国早在西汉就以破布为原料制成了麻纸。公元105年,蔡伦对造纸技术进行改良,将树皮、麻绳头、破布和渔网等作为原料,扩大了纸张的原料基础。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纸,絮一苦也。从系,氏声。”许慎认为,纸是席子上的一片絮。从现代考古发掘实物来看,最早的纸以植物纤维为原料,可见“絮”应为植物纤维(主要是麻絮)。

自诞生以来,纸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书写以外,人们还将纸用于包裹物品与日常清洁。及至11世纪,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中国开始流通。

在中国,纸张有力促进了书籍文献的出现和科学文化的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书之风兴盛;唐宋之际,刻书印书大量出现。法国华裔作家程抱一认为,对中国人而言,纸是一个生命空间。中国人在纸上行走如同在宇宙中穿行。美国艺术史家乔纳森·布鲁姆认为,中国纸是丝绸之路上传播

的最重要的商品,“丝绸虽然珍贵华美,却只是奢侈品;而纸张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世界”。

中国造纸术走向世界

中国纸的世界之旅经历了由近及远的过程,其中不乏戏剧性的转折。中国造纸术于公元3世纪传至越南,公元4世纪传到朝鲜半岛,并在公元7世纪由裴征和尚带入日本。公元8世纪中叶,一名擅长造纸的唐朝士兵阴错阳差地将中国造纸术带入阿拉伯世界。

此后,阿拉伯人不断改进技术,生产出阿拉伯纸。现存最早的阿拉伯纸文献是写于公元874年的一封信。公元900年前后,开罗建立非洲第一家造纸厂。这也标志着莎草纸在埃及的退场。

阿拉伯人掌握造纸技术后,大力兴建图书馆,在希腊经典保存、再阐释并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伴随着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造纸术很快便传到西班牙。12世纪,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哈蒂瓦小镇建成欧洲第一家手工纸厂。此后,西班牙人在靠近法国的维达隆建立造纸厂,法国人很快引进造纸技术,在南部城市埃罗设厂。1276年,意大利第一家造纸厂在法布里亚诺附近建立。这座造纸厂在金属加工和纺织业为支柱的小镇很快发展为欧洲造纸中心,一度拥有几百家造纸作坊。

14世纪末的欧洲人已能大批量造纸,纸张在意大利的价格是羊皮纸价格的1/6。1798年,法国人发明世界上第一台造纸机,延续1700多年的手工造纸技术步入机械化时代。19世纪中后期,由机器制造的纸张经贸易渠道“回到”造纸术的起源地中国。

在欧洲历史上,廉价方便的纸张对思想的传播、知识的普及和文艺复兴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意大利生产的优质纸张成为达·芬奇和古登堡等人的得力工具,开启了现代书籍和印刷时代。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也大大提高知识传递的效率,并促进不同地区间文化的交流、传承与发展。纸与印刷技术的结合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1885年,奥地利植物学家威斯纳对公元9至10世纪的阿拉伯古纸进行化验,证明它们都是麻纸;20世纪初,威斯纳又化验了公元3至4世纪的中国古纸,得到相同结果。植物纤维纸由中国发明后传至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历史轨迹逐渐清晰。

人类发明了纸,纸也塑造了人类文明。造纸术从中国走向世界,每到一地,人们在掌握这项技术的同时,尽可能利用更易获取的原料和工具不断优化和改进造纸流程。这一路的因地制宜,不仅造就了纷繁多彩的纸张品种,也促进了造纸术的创新和进步。最终,一张粗糙不均的废麻薄片,进化成今天精美上万、涉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品类纸张。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mbgjr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

格陵兰岛的本真

郭梓云



初抵格陵兰岛第二大城市西西缪特,正逢一场激烈的雪橇犬比赛。天空广阔澄净,地面白雪皑皑,远处雪山蜿蜒。突然间,仿佛有什么从远方雪色中一跃而出。仔细看,十几只雪橇犬奋力狂奔,一路溅起飞扬雪沫。骑手牢牢握着缰绳,控制雪橇犬的方向和速度。冰天雪地间,赛况正酣,观众的欢呼鼓掌声不绝于耳。优胜者抵达终点后,人们冲上去将他和雪橇高高抬起,庆祝胜利。

驾雪橇深入自然,采草叶做茶,用打猎所获的驯鹿肉、麝牛肉做一顿佳肴,看窗外雪花纷扬而下……很多格陵兰岛人的生活日常便是如此。久居钢铁森林中,我惊异于格陵兰岛人对自然如此熟悉,与自然如此亲密。

在格陵兰岛,猎人或许是与自然接触最密切的群体。“我明天出海,希望捕些猎物去集市上卖。”职业猎人廷斯娴熟地切割着捕获的海豹肉,“不过也不好,要看天气。”他兴致勃勃地展示打猎间隙拍摄的视频:在夏天的山中追踪驯鹿,或在船上远眺趴在浮冰上的海豹。时节不同,动物习性各异,猎人需时时掌握天气变化、环境特点,锻炼眼力和耐心。“祖父教我打猎的技巧,我又教给儿子。我们的捕猎技术就这样代代传承。”

对廷斯而言,渔猎生活不乏艰难,却有一种自在坦然。数千年来,格陵兰岛人根据环境特点,探索出合适的生存方式。他们将雪橇犬驯化为忠实的工作伙伴,用自制鱼叉和皮划艇出海捕猎。夏季,他们迁往内陆狩猎驯鹿,用动物皮搭建帐篷;冬季,他们返回沿海定居点捕猎海豹和鱼类,以毛皮制衣御寒。他们顺应季节更替与动物迁徙,享受冬日冰雪,也期待夏日繁花。自然塑造着格陵兰岛人的生活方式,也孕育出他们顺时而为的生活理念。

天空、海洋、陆地,都为格陵兰岛人提供生存资源。生命有其规律,人类遵循自然,将自己化入其中。“新鲜的食物、纯净的水、暖和的衣物……我们的一切

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内心充满感激。”西西缪特博物馆馆长多特·奥尔森语气恳切,眼中闪烁着对格陵兰文化的自豪。“我们相信,若非为了果腹,就不应当猎杀。取之于自然的,永远不应多于实际所需。”千百年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这里一以贯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智慧和哲学。

时至今日,在格陵兰岛,渔猎已非所有人的生存必需,却仍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生活方式。驾着雪橇驶入冰雪覆盖的荒原,四野一片寂静,唯有风声呼啸,阳光在雪地上闪烁细碎光芒。那种天地间只此一人的辽阔和静谧,令人难忘自然的宏大与深远。“这种体验独一无二。我在自然中寻找平静,治愈自己。”当地人安德斯微笑着讲述自己喜爱格陵兰岛的理由。

时代在发展,今天的格陵兰岛渴望通过旅游业推动经济增长。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提出为期10年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旨在实现自然、社区与文化和谐共存,同步发展。在“冰盖门户”康格鲁斯瓦克和西西缪特之间,“北极圈公路”正在建造,将有效提升陆上交通便利度,盘活两地旅游资源。同时,政府和施工方细致保护着沿途驯鹿和麝牛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避免破坏自然景观。公路沿线的“冰与海之间的因纽特人狩猎场阿斯维斯尤特—尼皮萨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正考虑向游客提供捕鱼和狩猎体验项目,在适度开放的同时兼顾生态保护与居民生活。“我们不要一个新的格陵兰,”当地工作人员潘宁瓦克说,“我们想让人们看到本真的格陵兰。”这种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审慎态度,正源于格陵兰岛人对自然的依恋。

实地探访格陵兰岛前,我总以为,在严酷气候中生活的人必然背负着数不尽的生存艰辛。直到踏上这片蔚蓝海岸与冰雪荒原,当地人平静、友善、充满生活热情的目光一次次相遇,我才明白寒冷与艰辛之外,这片土地同样孕育着安宁与自在。格陵兰岛人不占有自然,他们与万物生灵在这片交融了故土深情与生活热爱的寂静之境共同生息,从自然中来,也归于自然。

下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海边一景。 郭梓云摄



棉花堡记

杨晓杰



那是一个春天,我们去土耳其旅游。飞机降落在代尼兹利哈尔达克机场时,已是午后。我们登上旅行社安排的中巴,一路向南开去。车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行驶大约1个小时,穿过几座安静的小镇和一片片橄榄林。在棉花堡停稳时,天边泛起绯红的晚霞。

我走下车,迎面不远是一道白晃晃的山坡,那山坡很长,足有2000多米,像被大团云朵覆盖,云层里似是倒进了牛奶。走近看,有一层一层明显的阶地,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钙化的梯田。田里浅淡蓄着一层温泉水,水底是乳白色的石灰华,望去如同整块白玉。水从山顶流下来,漫过一层层台阶,在每一级凹陷处汇成浅池。

这由温泉水冲刷形成的白色梯田,便是棉花堡(Pamukkale)名称的由来——在土耳其语中,这一词语意为“棉花城堡”。这里也被音译为“帕姆卡莱”。1985年,它与古城希拉波利斯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棉花堡的池水是极淡的蓝色,像把天空剪下一角。众人脱了鞋袜,卷起裤腿,踏进温泉水里。这里的水从100多米高的岩石中流出,温度和体温相近。只是这些石灰华并不光滑,光脚走在凹凸不平的池子里,阵阵酥麻从脚底缓缓传来。

沿阶地往上走,白色渐渐漫上来,漫过脚踝,漫过膝盖,仿佛整个人都要被白色吞没。回头看,来路已经模糊在一片白茫茫的光里,只有远处黛青色的山峦

还保持着清晰的轮廓。有人坐在边石坝上,像坐在冰雪里。只是这“雪”,不冷。

等我们坐上缓缓上升的热气球,棉花堡在脚下越来越小,层层叠叠的白色阶地像一条瀑布凝固在山坡上,又像一整桶奶倾泻而下,自由凝结。难怪此处的传说中,牧羊人忙着同月亮女神幽会,忘记了挤羊奶,羊奶流遍丘陵,形成了棉花堡。同行的朋友指着远处说,那是希拉波利斯的。果然,在棉花堡上方,隐约可见几根石柱,像弓着背的老人,守望这片白色奇迹。人们大概发现了这里的温泉,便在上面建了城。2000多年前的浴场、神庙、剧场,如今只剩断壁残垣。

山脚下,有一个极小的村庄。次日一早,我们走进村里的小餐馆,店主是个胖胖的土耳其男士,英语说得不好,却极热情,用手势比划着推荐饭菜。我们点了扁面包、米布丁、白面包、黄瓜柠檬沙拉、陶罐烤酸奶,以及一人一杯柠檬汁。扁面包上餐桌,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土耳其”的英文。撕开面包,蘸着酸奶酱吃,竟是说不出的美味。特别的是米布丁,奶白色的一小碗,表面烤得焦黄,用勺子舀起来,能拉出长长的丝。甜而不腻,入口即化,像棉花堡的水流过舌尖。

临行前,我们去看了希拉波利斯的遗址。石柱东倒西歪地躺着,杂草从石缝里长出,不知名的小花悄悄绽放。有个圆形剧场保存尚好,坐在石阶往下看,仿佛能听见2000多年前的掌声与欢呼。风吹过,草叶沙沙地响。

告别棉花堡时,车开出很远,我回头望,它还在那里,白茫茫的一片,像一首无声的诗,写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旅途向前,人也向前,有些景象会像这白色梯田,在记忆里层层沉积,安静又明亮。